

黄爵滋与燕行使臣的不遇之遇及其文学影响

吴正岚, 黄逸欣

摘要:朝鲜燕行使臣与中国士人之间交往方式与思想依据的独特性,是中朝文化交流中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清代名臣黄爵滋十多年不在京城,却长时期为朝鲜使臣所向慕,这为分析中朝士人之间的不遇之遇及其文学影响提供了基础。在京期间,黄爵滋曾至少与六批朝鲜使臣交游往还;黄爵滋离开京城之后,又委托自己的朋友张炳英和儿子黄秩林接待使臣。黄爵滋在文论上以“诗心”缩合“江山”与“鬼神”,这一观点是在中朝士人的密切互动中逐步成熟的;黄爵滋不在都、不得讯、归道山等否定性情境触发使臣的“不遇”书写,深化了燕行文学的情感维度。

关键词:燕行;使臣;黄爵滋;不遇之遇

作者简介:吴正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08)

黄逸欣,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08)

关于燕行使臣与中国士人交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以往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爬梳,而有待进一步开掘的是燕行使臣与中国士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及其文学影响。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朝士人之间的向慕之情和信息沟通,往往在双方长时间不能见面的情况下得以保持甚至加深,本文试将这一现象称为中朝士人之间的不遇之遇^①。

清代抗英禁烟名臣黄爵滋(1793—1853)与燕行使臣的交往,就是这种“不遇之遇”的代表。以往的研究已经考察了黄氏与朝鲜译官李尚迪的交谊^[2],但一个尚未引起注意的问题是:1835—1839年黄爵滋至少与六批燕行使臣交游,而1839年之后的十几年间,黄爵滋不在京城,无缘与燕行使臣直接交游往还,但他为什么一直受到燕行使臣的向慕?直至1850—1851年之交,权时亨以“进贺谢恩兼岁币使行”之副房裨将的身份来京,在其《石湍燕记》中录其《赠树斋序》,开篇即云:“余自童卯闻黄树斋大名,如雷灌耳。每于冠盖往来,辄问‘树斋先生安否’,则口口皆称‘不在京’。余莫知其故,未尝不纾菀于中。岁庚戌之冬,从榷榷入上都。越明年,辛亥春,正拜先生于旅次。”^{[3]282}由“不在京”一说,可以窥见燕行使臣欲见黄爵滋而不得的怅惘之情。那么,黄爵滋十多年不在京城、不与朝鲜使臣晤面,他与燕行使臣之间的不遇之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除了众所周知的书信往还、寄物寓情之外,黄爵滋还采取了哪些方式与朝鲜友人互通音讯?中朝士人之间的不遇之遇对双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的朝、中史料,如以任百渊《镜语游燕日录》及孙衣言《逊学斋诗钞》等为依据,在梳理1835—1839年黄爵滋与燕行使在北京之会晤的基础上,考察1839年之后燕行使与黄氏的不遇之遇,以期揭示中朝文化信息交流的独特性以及文学史意义。

一、黄爵滋与燕行使臣在京城会晤

关于黄爵滋与东使的交游,黄氏《赠赵羽堂副使》自注曰:“予居客卿三载,先后晤东使赵心庵、权彝斋、

申翠微诸君。”^{[4]370}实际上,迄于1839年,黄爵滋在京城接待的使行至少有六个批次。

其一,1835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十六的“冬至使行”中^{[5]1052},黄爵滋与副使赵斗淳通过诗歌唱和结下了深厚情谊。由赵斗淳《次黄树斋爵滋诗草韵序》^{[6]85-86}、《青云斋赴黄树斋小集以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为韵余得式字遂成五篇分属会中诸人》^{[6]92-93}可知,1835年十二月十九至除夕之间的鸿胪寺演礼日,黄爵滋以鸿胪寺卿的身份与赵斗淳等使行初次会晤。数日后,赵斗淳拜访黄爵滋,后者以《树斋诗草》四卷请赵斗淳指正。1836年正月初二,黄、赵二人又聚会于黄爵滋的文墨之交艾畅的寓所青云斋。此次青云斋集会,中方除黄爵滋之外,还有郭羽可(名仪霄)内阁中书^③、艾至堂(名畅)举人^④、江龙门(名开)进士及第^⑤、杨朗山(名熙)刑部主事^⑥四位士人。此外,赵斗淳以朝鲜驸马洪海居^⑦诗集赠清人,黄爵滋^{[4]369}和黄钊^[7]皆为之题诗。

在与这次使行的交游中,黄爵滋与赵斗淳颇为投契。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卷二有两首写给赵斗淳的诗作,分别是《寄题赵心庵临江亭子》《得赵心庵书却寄》,都抒写了别后的牵挂之情。赵斗淳亦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与黄氏结交后的喜悦,其中“安得携君东渡去,十洲亲见好楼台”^{[6]95}折射了双方在山水观和交谊方面的共鸣(说详下),正因如此,1851年黄爵滋与燕行使臣权时亨笔谈时,还深情回忆起这句诗^{[3]172}。

其二,1836年二月初九至六月初九的“进贺兼谢恩使行”^{[5]1052}中,黄爵滋与正使权敦仁(号彝斋)结下了绵长的友谊。对于权敦仁的此次使行,朝鲜申纬(1769—1845)、金正喜(1786—1856)等人分别作诗饯行^[8]。申纬还记载了黄爵滋等人为使行作题画诗的活动,即权彝斋向诸人出示申纬所题《绿意吟诗图》,黄爵滋、郭仪可、艾畅、澹隐山人周霁岚等人为之题诗^⑧。如前所述,黄氏在其《赠赵羽堂副使》一诗自注中亦提及与权彝斋的交往。

其三,1836年十月十二至1837年三月十七的“冬至兼谢恩使行”^{[5]1052}之际,黄爵滋为正使申在植编选的唱和诗集《相看编》作序。此次使行多文人雅士,以至有“文星照耀”之誉^{[9]13}。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到,任百渊《镜语游燕日记》详细记载了《相看编》的出版始末,提到了黄爵滋在作序之外,还有重校、重选之功^{[9]234}。至于黄爵滋重校、作序的时间,《相看编》所载黄序篇末云“道光丁酉人日豫章黄爵滋书”,已点明是1837年正月初七。在这次交往中,黄爵滋作为文坛学界师长的地位已在使臣心目中明确了起来。《镜语游燕日记》“(丁酉正月)十七日乙未”云:“树斋名爵滋,时望蔼蔚,以文章学术,彼中新进皆推为师长者。”^{[9]234}此前赵斗淳对黄氏虽有“君今富声实,掉鞅云路直”^{[6]92}的赞誉,但直至任百渊才明确指出了当时后生对黄爵滋文章学术的尊敬仰慕。

其四,1837年四月二十至八月十五的奏请兼谢恩使行^{[5]1053}中,副使礼曹判书赵秉铉、副房裨将朴思浩^⑩、译官公干李尚迪^⑪等人与黄爵滋交好。如前所述,黄氏《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卷二有《赠赵羽堂副使》《赠朴心田李藕船两从事》,正是分别赠予赵、朴、李三人的。此外,同卷还收录《慈仁寺古松联句诗》,又《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十一载《慈仁寺古松图诗跋》。朝鲜方面,李尚迪不断回忆这次使行,于癸卯(1843)、甲寅(1854)先后写下怀念“丁酉(1837年)夏”之聚会的诗篇^{[10]195,257}。关于黄爵滋与此番使臣的交往,以下两点事实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首先,黄爵滋与李尚迪的订交是在此次,但在此之前的黄、李之交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理由如下:一是此前李尚迪诗作入选《相看编》,其次是黄爵滋在别后写给李尚迪的尺牍中有“续此良晤”^[11]之说,提示了黄爵滋与李尚迪的初次见面早于丁酉(1837年)夏,很可能是在1836年冬。其次是黄爵滋在慈仁寺招饮使臣,并非以往所认为的一两次,李尚迪《过慈仁寺》诗序已明言“丁酉夏,……屡为文酒之会于此”^{[10]195}。

其五,1837年十月十七至1838年三月十六的“冬至兼谢恩使行”^{[5]1053}中,副使金兴根与黄爵滋颇有交游。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八所收《朝鲜使者饮钱联句帖序》云:“自予由御史官鸿胪,先后晤东使,若心庵赵公、彝斋权公、翠微申公,及赵公羽堂而四,及金公游观而五焉。游观之来,羽堂寄诗帖,索予序,盖去夏心庵诸公钱羽堂而联句之作。”可见,继赵秉铉之后,金兴根(字游观)亦曾访问过黄爵滋,并受赵秉铉之托,带来1837年赵斗淳等人饯别赵秉铉的联句之作,请黄爵滋为之作序。如前所述,权时亨《石湍燕记》亦载黄爵滋自述与金兴根交好。

其六,黄爵滋与1838年十月二十至1839年三月二十四的“冬至兼谢恩使行”之书状官李时在等人亦

有交往^{[5]1054}。《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卷二收《龙树寺次韵答李秋斋行人》一首。由朝鲜申纬《题秋翁书斋记后赠古东尚书并序》自注和清人孙衣言《人日汪郎中孟慈招同黄鸿胪李禾叔陈秋谷钱东使李秋斋于蒹葭阁用秋斋韵以送其行二首》自注可知,李秋斋学士名时在,为燕行使臣。孙衣言此诗作于己亥(1839)人日,可知此番使行乃1838年十月二十启程的“冬至谢恩使行”,由正使李羲准、副使尹秉烈和书状官李时在组成。从黄爵滋的仕宦经历而论,1838年黄氏奉旨充殿试弥封官,次年二月迁任大理寺少卿,钦派从耕大臣,直至四月才偕同左副都御史鄂尔端前往杨村查验驳船^[12]。换言之,此番使行寓京期间,黄爵滋正好在都。关于黄爵滋与李时在的交往,孙衣言《逊学斋诗钞》还录有作于己亥的《黄树斋先生招集城南禅院钱李秋斋及其侄承谦归朝鲜用树斋先生韵》^{[13]280}和作于乙卯(1855)的《集润臣所之次日孔绣山以燕朝鲜客见召为事不能往已闻汴生同年得交字因思余诗中未尝有是韵诗戏为一首呈绣山兼示汴生》,后者篇末自注云:“十余年前,常从黄侍郎于城南江亭,与朝鲜使臣李秋斋辈饮酒赋诗。”^{[13]296}乙卯(1855)上距己亥(1839)十六年,可见己亥聚会对于主客双方来说,都是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

概言之,从1835至1839年,黄爵滋至少接待过六批燕行使臣,其与朝鲜行人交谊深厚的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如前所述,黄爵滋为京城文坛学界之师长。二是黄氏殷勤地招饮朝鲜使臣。三是黄氏对地位不高的行人也视为知交、热情酬答^⑤,比如为副房裨将朴思浩、译官公干李尚迪作《赠朴心田李藕船两从事》中“悬知别后同秋思,月上金华第几峰”^{[4]370}等诗句,充满了与知交惜别的依依不舍之情。

二、黄爵滋不在京城期间与燕行使臣通声气的方式

权时亨赴1850年10月20日进贺谢恩兼岁币使行之时,距离1839年黄爵滋饯别书状官李时在,已有十多年了,此时权时亨仍然希望入京后能拜访黄爵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839年之后黄爵滋还采取委托亲友接待的方式,延续与燕行使臣的交情。

一是委托朋友张炳英接待李正履一行。关于黄爵滋委托亲友接待朝鲜使臣的明确记载,是尹程《西行录》载黄氏于1839年委托张炳英接待朝鲜使臣李正履一事。这一史料记载了1844—1845年之交尹程随其族兄即书状官尹纘赴“奏请兼谢恩冬至使行”的见闻^⑥。其中,“(乙巳(1845)正月)初三日乙丑”条记尹程拜访张虎头(炳英)的经历。张虎头与尹程论及其与黄爵滋在抗英方面桴鼓相应,并且提及“年前李醇溪来京,路遇黄树斋于京东邦均地,时树斋出使山海关,醇溪往见,语到英夷及邪教事,树斋不及细言,写信,属其到京问弟,故弟与醇溪相善,英夷始末、邪教源流,备细告之”^[14],由此可以窥见1839年黄爵滋委托张炳英接待朝鲜使臣李正履(字醇溪)的情形。此处所谓“年前李醇溪来京”,当是指1839年十月二十四,正使李嘉愚、副使李鲁秉和书状官李正履等人赴“冬至兼谢恩使行”^{[5]1054}。据洪直弼(1776—1852)《醇溪李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正履字审夫,……己亥(1839)差节使书状官”^[15]。对于李正履此行,朝鲜洪蕤周(1774—1842)、赵寅永(1782—1850)、李恒老(1792—1868)等人皆有赠行之作^[16]。又考黄爵滋生平,其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间奉命出使山海关查办有关事件^[12],由此可以推测,黄爵滋约在此前后与李正履一行相遇于邦均。

这次交流提示了黄爵滋不在京城时与使臣展开交流的方式之一,是委托志同道合的朋友代为接待。由前引文字可知,当黄爵滋与李正履在邦均相遇时,双方论及抗英禁烟等问题,由于旅途匆忙,黄爵滋便写了一封类似介绍信的信件,让李正履去北京后拜访张炳英。如前所述,在李正履关心的英夷、邪教等问题上,张炳英与黄爵滋意见一致,因而可以代传黄氏的观点。

对于中朝士人的交往来说,这次委托接待意义重大,不仅使得黄爵滋与张炳英作为抗英禁烟同道的形象在朝鲜使臣心目中真正确立,而且进一步提升了黄爵滋的人格魅力。换言之,京城之学界文坛师长为数不少,而以抗英禁烟名臣兼学界文坛师长者,可说举世无双。东人因此对黄爵滋越发钦慕,当是情理中事。其中的事例之一是,十一年之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二十至次年三月十八的进贺谢恩兼岁币使行间,以权大肯上使为首的使臣再三要求拜访黄爵滋:“上使士埜公往见之,副使奎堂金公、书状素陵闵公亦皆愿见。士埜公屡诵之,遂乃勉从。”^{[3]283}值得一提的是,权大肯是因为张炳英的介绍而愿见黄爵滋的。权氏曾于前述1844年“奏请兼谢恩冬至使行”任副使,期间曾拜访张炳英,论及英夷之祸(《西行录》乾卷“(乙巳正

月)初三日乙丑”),并通过张炳英而了解到黄爵滋的相关主张^④。

二是委托其子黄秩林^⑤(字子幹)接待李尚迪。前述1844—1845年之交的“奏请兼谢恩冬至”使臣中,有黄爵滋曾经热情接待过的李尚迪。此时黄爵滋因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户部银库亏空900余万两事,以失察罪而被夺职,先后主讲豫章书院、任南昌经训书院山长^[12],因而不在京城。值得注意的是,李尚迪此次出使时所参加的各项活动中,时常看到黄爵滋的次子黄秩林的身影。

其一,乙巳(1845)正月,张曜孙于吴赞寓所招饮李尚迪等朝鲜使臣,其后请吴冠英作《海客琴尊第二图》,以纪念此次宴集。由李尚迪《追题海客琴尊第二图二十韵》自注可知,此次聚会的十八人中,有“黄子幹侍御”;曹楸坚吟咏此次聚会的诗歌题目亦记“黄子幹秩林”参加了聚会^[17]。

其二,乙巳正月的聚会之后,由王鸿、张曜孙倡议,吴俊绘《春明六客图》,以纪念此次中朝文人的欢聚。黄秩林亦名列六客之一,折射了黄子幹与李尚迪以及相关的士人群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关于此图的绘制、题咏,先行研究已经进行了深入考察,兹不赘言^[18]。不过,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黄秩林之名列此图与黄爵滋的关系。孔宪彝作《题春明六客图并序》,序曰:

乙巳(1845)春,余与张仲远、陈梁叔、黄子幹三君,同应部试在京。王子梅走书介仲远,乞貌余于是图,请至六七,以事未果。既而,余与三君皆报罢,仲远铨武昌令,将先后出都。仲远复申前请,遂合写一卷,寄子梅于济南。六客者,仲远、梁叔、子幹、子梅与余及朝鲜使臣李君藕船也。余与李君实未识面,今读子梅自记之辞曰“风潇雨晦,独居岑寂之时,展视此图,不啻见我良友”,何其情之笃欤!率题二截句志意。他日春明重聚,或践六客之约,则此卷以为嚆矢矣。^[19]

根据这一史料,先行研究主张黄子幹因为与张曜孙等人同为在京应试的举人,得以参与接待李尚迪,被纳入了“六客”这一比《海客琴尊第二图》十八人更为密切的小团体。

事实上,对于黄秩林的这一身份,李尚迪的认知最为明确,其诗歌两次写到黄秩林,都强调黄秩林对父亲黄爵滋道德文章的传承。李氏于1855年作《子梅自青州寄诗索题春明六客图》,赞美“子幹有凤毛,大雅述乃爷”^{[10]258};又《续怀人诗》有《树斋黄侍郎爵滋》一篇,又有《子幹黄大令秩林》一篇,后者“宜黄好家声,修洁遗尘俗。循陔补白华,过庭赅秋菊”^{[10]272}云云,同样着眼于黄子幹的不坠家声。可见,对于黄爵滋委托黄秩林接待李尚迪的用心,作为客人的李尚迪是心领神会的。

此外,由黄爵滋《济南为王子梅题春明六客图》一诗题下的自注,可知黄爵滋有意识地强调六客这一群体与自己的密切联系:“六客者,朝鲜李藕船、阳湖张仲远、元和陈梁叔,暨予门人曲阜孔绣山、予子秩林,并子梅而六也。”^[20]原来《六客图》中的五位清人中,张仲远、王子梅^⑥乃黄爵滋之友,孔绣山、黄秩林分别为黄爵滋的门人和儿子,因而甚至可以说,这一接待李尚迪的文人群体,几乎都是黄爵滋的亲友。黄爵滋不在京的时期,不仅其儿子黄子幹,其他亲友也承担了代替黄爵滋接待李尚迪的角色。这次委托接待实质上揭示了黄爵滋在朝鲜使臣心目中的人格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黄爵滋与其亲友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黄爵滋与朝鲜使臣交往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黄爵滋与燕行使臣投契的深层原因,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双方在文学观念上的桴鼓相应。这里着重考察黄爵滋融“江山”与“鬼神”于一炉的“诗心”说,分析此说如何在中朝士人的文学互动中逐步成熟。上引蒋寅《黄爵滋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一文认为,黄爵滋的文学理论以纠正浮诞文风为己任,主张从体、气、理、法四方面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从黄爵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来看,他尤为重视气和理这两个层面,其具体命题则以“诗心”来统合“江山”与“鬼神”。

黄爵滋以“诗心”来统合“江山”与“鬼神”的倾向,在其写于1837年正月的《相看编序》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其说云:“洗毫伸纸,洒墨联吟。原本山川,扶持神鬼。海霞翩其挹袂,关雪郁其荡胸。遂使白月争辉,孤云让美。顾诗者心也,心相感则相通;诗者迹也,迹相看则相合。以作者一时之迹,证读者千秋之心,其可以已乎,其不可以已乎?”^{[4]562}此说将“诗心”诠释为以作者之迹证读者之心,而作者之迹的意义在于“原本山川,扶持神鬼”,这就建立起由“诗心”“山川”和“鬼神”等要素构成的文论系统。

这一文论系统与前述理气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其一,黄爵滋所谓“诗心”与

“理”的贯通,可由其《秩林诗序》“孔子称不学诗无以言,朱子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故能言也”^{[4]555}一说窥见其端倪。此说折射出黄爵滋所谓“诗心”与“心气和平”相关联,且与其“夫性灵之说有正无邪”^{[4]591}之说相呼应。作为对当世狎褻之风的反拨,黄爵滋标举“心气和平”意义上的“诗心”,可谓纲举目张。其二,黄爵滋反复论述风土山川与文气的关联。比如,《徐云峰前辈为题游庐山五少图次韵奉酬》赞誉郭仪霄等人“采壮江倾峡,气雄华峙雍”^{[4]262},正是以山川比喻壮采雄气;《衢州舟次除夕》亦有“奇气逼金剑,壮思翻银澜”之说,描述山河激发奇气壮思的情形。因此,推崇“山川”,可以理解为试图以此纠正“乱于气”的文坛弊端。

推崇“诗心”“山川”“鬼神”这三个层面的观念,是黄爵滋的文学思想与朝鲜使臣相互激荡的结果。首先,黄爵滋《相看编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者心也”一说,从文字上看,作者希望以作者之迹来证读者之心,似乎将“诗心”与“诗迹”等量齐观,实际上,“诗心”为黄爵滋文论体系的核心,而“诗迹”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诗心”的核心地位正是黄爵滋在与燕行使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一,黄爵滋素来重视诗心,其《诗心》一首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人格和审美境界:“诗心似月圆,万古照青天。鸾凤光中舞,山河镜里悬。浮云蔽空旷,残夜泣婵娟。独有蓬莱顶,相携一洒然。”^{[4]321}这首诗的意境令人联想起李侗称引黄庭坚“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21]之说以赞誉道学气象,由此可见,黄爵滋于儒家思想,尤重“光风霁月”的洒落一派,是以儒家思想体系包容佛道超然自由境界^[22]。其“诗心”说亦当从这一角度加以解读。黄爵滋《卢籟亭孝廉箴》有“诗心与鹤唳,清洁两相期”^{[4]308}之句;其《味雪斋吟草序》亦明确提出了“夫诗者,心之声也,志之律也,故得失归乎证心,美恶存乎辨志”^{[4]553-554}一说。第二,黄爵滋与赵斗淳的唱和使得“证心”说成为双方同气相求的理论基础。从黄爵滋在别后所作《寄题赵心庵临江亭子》篇首“海上飞鸿恰送音,碧天如洗悟诗心”^{[4]371}句,可以推测赵斗淳的“心庵”之号与黄爵滋的“诗心”说不谋而合,当是使得双方一见如故的原因之一。两人在“证心”方面的投契尤其值得重视。如前所述,作为“诗心”说的重要逻辑环节,黄爵滋《味雪斋吟草序》强调“证心”^⑩,其《相看编序》亦主张“以作者一时之迹,证读者千秋之心”,无独有偶,前引赵斗淳“证心斯有得”“证得君心当歌舞”等诗句,也一再提及“证心”。第三,正如黄爵滋在领悟“诗心”的同时提倡“真性情”,赵斗淳的“性情”说也是对黄爵滋“诗心”说的呼应。黄爵滋在《仙屏书屋初集》卷首《自序》开宗明义地强调真性情,不仅援引张际亮(1799—1843)“性情既真,诗无不工”之说,还引用艾畅“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为也”和汤鹏“性情之沉挚”。该篇褒赞真性情的说法俯拾皆是,其内涵则不外乎“其意之忠厚也”“中正无邪之旨”“忠诚悱恻”“昔儒所谓天理人情”^{[4]245-249}等层面。与此相呼应,赵斗淳《题郭羽可诗集》开篇便点明“诗固观世教,亦以知性情”的文学观,并进一步申论“之情由之性,如黑白易明”的性情说。此外,赵氏《题江龙门诗草》其四“有是心灵有是文”^{[6]96}亦可视为对黄爵滋“诗心”说的诠释。

其次,黄爵滋与燕行使在重视“山川”与“鬼神”方面的契合,颇耐人寻味。第一,除了《相看编序》以外,黄爵滋将山川与鬼神相结合的说法还见于《艾至堂诗序》:“构思沉冥之乡,得意飞腾之境。江山凄婉,鬼神惊泣。非矜别趣,自发真詮。”^{[4]553}将此说与《相看编序》参看,可知作者主张诗歌创作以山川和鬼神为灵感的主要来源。此外,黄爵滋《登五老峰赋》自述游庐山而梦神人授《古松图》,这一梦境也折射了融“江山”与“鬼神”为一体的观念,因而黄氏对此颇为自负,在《慈仁寺古松联句诗》注中再次提及:“树斋尝游庐山,梦神人授《古松图》。”^{[4]370}不仅如此,黄爵滋从庐山归来后,将梦境绘成图画,并邀请多位友人为之题咏^{⑪[6]95-96}。通过这一方式,黄爵滋有关“江山”与“鬼神”并重的观念,可说是广为人知。第二,中朝士人在山川与鬼神方面的互动值得关注。比如,作为对黄爵滋《相看编序》的回应,申在植《相看编跋》亦推崇山川和性灵:“方其历览山川,晨夕吟哦,率尔寄兴,间以谐谑,声韵之工不工,所不计也。然诗之为道,源于性灵,而风裁品格各著于跌宕悠扬之中。”^{⑫[23]}虽然申在植没有提及“鬼神”,但他以“山川”和“性灵”之说呼应黄爵滋《相看编序》的“江山”“鬼神”以及“诗心”,从互文的角度来说,“鬼神”说当暗含于《相看编跋》之中。又如,对于黄爵滋登庐山而梦神人一说,赵斗淳和朴思浩都津津乐道,在诗文中一再提及,其中,赵斗淳《黄树斋游庐山日梦有老人授以古松图既归遂因想而绘之绘左右多一时名隽笔乃又属余曰此未来情根所在也子其有以题之遂以两绝书而还之》以长题叙述了黄爵滋遍请题咏的来龙去脉,诗中“匡庐秀色已韬人”“十洲亲见好楼台”等句,亦着重回应了黄爵滋的江山观。不仅如此,赵斗淳还在《题黄树斋诗集》中再次提及“庐北梦回松树碧”^{[6]96},可见其对黄爵滋庐山梦以及相关“江山鬼神”说的密切关注。此外,由前引黄爵滋

《慈仁寺古松联句诗》注可知,朴思浩所作联句“前程应梦兆”^{[4]370}亦吟咏黄爵滋庐山之梦。

概言之,黄爵滋与朝鲜使臣围绕“诗心”说展开的互动绝非偶然,对于崇尚儒家诗教、言必提“治心”^⑩说的朝鲜士人来说,黄爵滋“诗心”论无疑令他们倍感亲切;燕行使臣对行万里路的书写,进一步增强了黄爵滋对江山之助的重视;赵斗淳、朴思浩对黄爵滋庐山梦的吟咏,使得双方的志同道合之感进一步加深。

此外,与“诗心”说相关联,“不得讯”等否定性情境增加了燕行诗文的抒情力度。如前所述,黄爵滋与燕行使臣的交游,堪称“不遇之遇”。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来看,导致不能直接交流的种种否定性情境,触发朝鲜士人写出以“不遇”为情境的作品。以李尚迪为例,1837年李尚迪结束使行回到朝鲜以后,虽然又多次出使中国,但始终没有机会与黄爵滋重逢,甚至在1844年至1851年之间,连音讯都无法相通,李尚迪为此撰写了多首诗歌来抒发不遇的悲怆。众所周知,自六朝以来,中国古代诗歌就有描写“不值”“不遇”等情境的传统,如梁吴均《诣周承不值因赠此诗》、陈子昂《酬田逸人游岩见寻不遇题隐居里壁》等^[24]。同样,燕行诗文中也不乏叙写“不遇”的文字,比如,许筠《朝天记》收录《城东访李生不遇》《访李判官不遇》^[25],李一相《燕行诗》载《过常山南益吾侨庄不遇留题》^[26]。在燕行文学史上,李尚迪之“不遇”书写的意义在于通过不在都、不得讯和归道山等“不遇”情境,使得“不遇”情境的悲剧性臻于极致并实现升华。

其一,因“不在都”而不遇的情境,以1842年10月至次年3月李尚迪赴冬至兼谢恩使行为例。是年李尚迪再次经过慈仁寺,写下了《过慈仁寺》一诗,其自注云:“丁酉夏,与端木鹤田中翰、黄树斋侍郎、汪孟慈农部、陈颂南御史,屡为文酒之会于此。鹤田归道山已七年,其余诸君皆不在都,怆然有作。”^{[10]195}此诗兼怀端木国瑚(鹤田)、汪喜孙(孟慈)、陈庆镛(颂南)诸人,并不专为黄爵滋而作,但是不妨认为,此诗主要是为黄爵滋而作的。因为在慈仁寺的聚会中,黄爵滋是主要组织者。李尚迪《续怀人诗》“树斋黄侍郎爵滋”一首以“联句慈仁寺,载酒陶然亭”^{[10]270}开篇,揭示了慈仁寺与怀念黄爵滋之间的联系。而且,关于慈仁寺联句的活动,如前所述,黄爵滋诗文中还收有《慈仁寺古松联句诗》《慈仁寺古松图诗跋》。因此,李尚迪《过慈仁寺》主要是抱憾于黄爵滋的不在都。诗歌回忆往日的文酒之会,并憧憬与黄爵滋等人的重逢。所谓“十年独过黄垆下,几日重吟白社前”,显然,通过这次李尚迪来京经过慈仁寺而黄爵滋等人“不在都”的体验,李尚迪对黄爵滋的向慕进一步加深,诗歌的抒情力度有所增强。

其二,“不得讯”的情境以1844年李尚迪向柏葭打听黄爵滋的音讯为例。与此相关联,李尚迪和黄爵滋先后抒发了不通音讯的怅然。先行研究已经注意到,1844年柏葭(1794—1859)出使朝鲜时,担任差备官的李尚迪作《次柏静涛正使清川江韵》,提及黄爵滋,有“他时倘得黄公讯,为报相思满月如”之句,又自注云:“迪与黄树斋,别已八年矣。”^{⑩[10]196}对黄爵滋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的一问题是:为什么李尚迪在次韵柏葭的诗歌中抒发对黄爵滋的思慕?原来,柏葭此次出使时,向李尚迪赠送了《华岳题壁诗》拓本。柏葭《薛霖吟馆钞存》卷四收有柏氏《清川江》,并附《差备官李藕船尚迪原唱》,即《次柏静涛正使清川江韵》,不过自注与《恩涌堂集》小异:“大人见贶《华岳题壁诗》拓本,即与树斋黄侍郎宦游时作也。尚迪于黄公有旧,契别已八年矣,结句因及之。”^[27]由此可知,柏葭在赠送这件拓本时,提及与黄爵滋一同出使关中的经历,因而勾起了李尚迪对黄爵滋的思念之情。柏葭向李尚迪赠送《华岳题壁诗》拓本一事,蕴含着多重情感意义。首先,这一拓本是柏葭与黄爵滋交谊的见证。1841年11月,黄爵滋奉旨偕侍郎柏葭前往陕西查办事件,途中两人多次诗歌唱和,《薛霖吟馆钞存》卷三录有柏葭的唱和之作五首,可以想见当时的吟咏之乐。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未收此次唱和之作,不过诗后录卷二载《三迭前韵酬柏静涛》,以“挑灯聊话旧游时”结篇,也表达了对此次同游经历的怀念。其次,这一拓本引起了李尚迪对黄爵滋的怀念,“他年倘得黄公讯”一说,写出了李尚迪不能与黄爵滋通音讯的怅惘。换言之,不得讯的情境,恰恰激发诗人写出真切动人的诗句,也折射了诗人因为不得好友的音讯而更加思念好友的心情。

令人唏嘘的是,1851年黄爵滋接待权时亨等使行时,委托他们向李尚迪问好,也提到“而其余朴心田名思浩、李藕船名尚迪不得各讯,兄或以此意归谗乎”^{[3]278-279}。由此可见,对于不通音讯的状况,黄爵滋也深感遗憾。

与“不在都”相比,黄爵滋与李尚迪等中朝士人双方都感受到的“不得讯”之痛,显然又加深了一层,这从李尚迪“他年倘得黄公讯”一句的虚拟语气和“迪与黄树斋别,已八年矣”一说的缠绵之意中可窥一斑;同样,黄爵滋于1851年所谓“不得各讯”的怅惘,也许可以视为对1844年李尚迪“他年倘得黄公讯”的隔空

回应。

其三,归道山的情境,以1854年李尚迪所作《道光丁酉夏黄侍郎树斋汪明府孟慈陈侍御颂南招饮慈仁寺有古松联句二十韵近阅树斋仙屏书屋集收录是篇而树斋已游道山矣怆然有作》为例。李尚迪读黄爵滋《仙屏书屋集》,注意到其中收录了《慈仁寺古松联句诗》,不禁回忆起了丁酉夏聚首的美好往事^{[10]257}。然而,黄爵滋已游道山。在此,从字面上看,李尚迪“怆然有作”一说似乎与1842年因“不在都”的不遇所激发的“怆然有作”并无二致,但其实已是天人永隔与天各一方的本质区别,诗歌的情感维度强化到了极致。

当“不遇”的情境发展到一方的“归道山”时,在情感深度达到最值的同时,因诗文不朽而友谊永恒的信念,在客观上使得“不遇”的情感实现了升华。比如,李尚迪在为黄爵滋的逝世而悲痛的同时,意识到“媿作蝇鸣诗句在,幸随骥尾姓名传”,这既是对双方诗作必将传之久远的自信,也是对两人交谊天长地久的肯定。在此,黄爵滋不在世的情境,使得燕行文学的抒情力度进一步增大。

1842—1854年,对于李尚迪来说,黄爵滋从不在京到不得讯,进而归道山,不可能见面的否定性情境一步步强化,因而诗歌的抒情力度不断增强。其中的原因在于1837年夏的密切交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换言之,双方相遇时精神契合的程度越深,不遇的情境激起的情感就越厚,不遇之遇就能更充分地实现。

从“诗心”说与“不遇”书写的关系而论,其背后的逻辑依据都是中朝士人对于实境与虚境互补的共识。换言之,“诗心”说所蕴含的“江山”之实境与“鬼神”之虚境交相辉映,“不遇”书写中的“心之所思”与“面之所见”表里合一。与其“诗心”说的超越性相关,黄爵滋甚至在《申翠微饮钱帖跋》中,提出了“心之所思”比“面之所见”更为深刻的友谊观:“虽然,六合至广也,以其所至,及其所不至,则气象弥远;四海至众也,以其所交,及其所未交,则心性益通。然则面之所见,孰与夫心之所思?犹夫身之所驰,孰与夫心之所涉?”^{[4]586}此说不仅说明了黄爵滋委托他人接待东使的重要意义,还表达了对中朝士人之间“不遇之遇”的信念。

结语

通过梳理黄爵滋在京期间与六批朝鲜使臣的交往,可以发现其与朝鲜使臣交厚的原因有:他以京城文坛学界之师长的身份,殷勤地招饮朝鲜使臣,特别是对地位不高的行人也视为知交、热情酬答。此外,黄爵滋离开京城之后,在书信往还、寄物寓情这些常见的方式之外,还采取委托接待的方式,先后委托自己的朋友张炳英和儿子黄秩林接待使臣。

黄爵滋与朝鲜使臣的“不遇之遇”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中朝士人的诗文唱和围绕兼重“江山”与“鬼神”的“诗心”说展开,另一方面表现为燕行文学中的“不遇”书写在情感维度上的深化。

注释:

- ① 孙卫国亦提及“时间滑入道咸时期,中朝学人间的交往出现了新特点,交往双方是否见面已经不重要,甚至于根本未见过面,但是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
- ② 此次使行的主要成员有正使判书朴晦寿、副使赵斗淳和书状官司仆寺正韩镇庭。
- ③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二十八载:“郭仪霄,字羽可,永丰人,嘉庆己卯举人,官内阁中书。有《诵芬堂诗钞》。”(民国退耕堂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五一五册收郭仪霄《诵芬堂诗钞》《诵芬堂诗钞二集》《诵芬堂诗钞三集》《诵芬堂诗钞四集》和《诵芬堂诗钞五集》。
- ④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三载:“艾畅,字至堂,东乡人。道光庚子进士,官博罗知县,有《至堂诗钞》。”
- ⑤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八载:“江开,字龙门,庐江人。道光乙未举人,官陕西知县。有《浩然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六〇八册收江开《浩然堂诗集》六卷、《浩然堂词稿》一卷。
- ⑥ 权时亨《石湍燕记》卷二“(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十一日戊子”载:“一个姓杨名熙,号朗山,杨忠武遇春之孙,西蜀人也,年可四十有余。官居刑部主政。”
- ⑦ 据《心庵遗稿》卷二十《徽庆园迁园志文》,朝鲜正宗之“女淑善翁主,下嫁永明尉洪显周”。又赵斗淳与洪显周有诗歌唱和,《心庵遗稿》卷九载《心远亭共洪海居都尉显周金薇西尚书在显拈韵》。
- ⑧ 申纬《警修堂全藁》册二十四《祝圣四藁·去年余为彝斋尚书题绿意吟诗图彝斋携入燕见赏于诸名士多有篇咏余又逐和

之以证四海墨缘凡五首》，五首分别为《次韵郭羽可仪霄》《次韵鬱树斋滋》《次韵艾至堂畅》和《次韵澹隐山人周霁岚诚之步紫霞黄山原韵》二首。按：“鬱树斋滋”当为“黄树斋爵滋”之误。

- ⑨ 此行由判中枢申在植任正使，礼曹判书李鲁集和掌令赵启升分别任副使、书状官。参见《同文汇考》补编卷七页。
- ⑩ 金贤根《玉河日记》“（七月）初五日庚辰”载“副房裨将朴思浩亦文士也”（《燕行录续集》）。在此之前，朴思浩于1828年10月25日赴谢恩兼冬至使行，撰有关于此次使行的《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
- ⑪ 金贤根《玉河日记》“四月二十日丁卯”载“以文学从译官十人，首译知事金相淳、公干李尚迪……”（《燕行录续集》）。
- ⑫ 蒋寅《黄爵滋诗学观念及其批评实践》述及黄爵滋对寒士的不遇抱有诚挚的同情，因而毕生不懈地表彰那些寒士朋友的诗歌，参见《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50页。这与黄爵滋对于燕行使中地位不高的行人也视为知交的态度恰相一致。
- ⑬ 此行于甲辰（1844）十月二十六离京（《西行录》乾卷，《燕行录续集》），次年三月十二还湾（《西行录》坤卷）。又《同文汇考补编》卷七记使行于“乙巳三月二十八日复命”。
- ⑭ 《石湍燕记》地卷“（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初二日己卯”载：“上使年前以副使闻其人于张虎头，故今始往见，多有好处云。”
- ⑮ 据《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四，黄秩林“字子幹，号仙樵，宜黄人。道光癸卯（1843）举人，官湖北知县。有《燕台吟草》《主静轩诗钞》”。
- ⑯ 张曜孙（1807—1862），字仲远，号升甫，晚号复生。江苏武进人。权石亨《石湍燕记》人卷“（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十六癸巳”条载黄爵滋云张曜孙“现官湖北武昌，颇有政声，亦与弟甚善”。又王鸿字子梅。关于张曜孙与李尚迪的交往，参见孙卫国《清道咸时期中朝学人之交谊——以张曜孙与李尚迪之交往为中心》；关于王鸿与李尚迪的交谊，参见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
- ⑰ “证心”出自嵇康《声无哀乐论》，其后多见于汉译佛典如《十诵律》《成实论》及其他佛典佛教著述。
- ⑱ 按：为黄爵滋的庐山图作题咏者，至少有潘世恩《黄树斋侍御匡庐纪梦图》（潘世恩：《思补斋诗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495，第667页）、刘嗣绾《题黄树斋庐山纪游图》（刘嗣绾：《尚絅堂诗集》卷五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469，第391页）、祁雋藻《题黄树斋游庐少图》（《馥馥亭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583，第17页）、吴嵩梁《题黄树斋游庐少图》（《香苏山馆古体诗钞》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482，第259页）和张际亮《为树斋太史题画四首》（《思伯子堂诗集》卷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601，第119页）。
- ⑲ 按：据此跋末尾“丁酉孟陬翠微翁题”，此跋作于1837年正月。
- ⑳ 比如，赵斗淳《冬雷后联劄》“而治心之要，舍讲学而无他道焉”（《心庵遗稿》卷十五），又云“治心之要，又在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心庵遗稿》卷十七）。
- ㉑ 按：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代“江亭文人”的雅集》称“在1845年他写给柏俊诗中有‘他时尚得黄公讯，为报相思满月如’”，参见《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按：柏俊于1844年出使朝鲜，《恩诵堂集》诗卷七序此诗于甲辰（1844年），因此，“1845”当为1844之误。

参考文献：

- [1] 孙卫国. 清道咸时期中朝学人之交谊——以张曜孙与李尚迪之交往为中心[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95-113.
- [2] 李春姬.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咸文人的交游[J]. 外国问题研究, 2010(2): 33-36.
- [3] 权时亨. 石湍燕记[M]//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 第91册. 首尔: 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2001.
- [4] 黄爵滋. 仙屏书屋初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580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 郑昌顺. 同文汇考 补编[M].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 1978.
- [6] 赵斗淳. 心庵遗稿[M]//民族文化推进会. 韩国文集丛刊: 307. 首尔: 景仁文化社, 2003.
- [7] 黄钊. 读白华草堂诗二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555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755.
- [8] 申纬. 警修堂全稿[M]//民族文化推进会. 韩国文集丛刊: 291. 首尔: 景仁文化社, 2002: 518-519.
- [9] 任百渊. 镜渚游燕日录[M]//林基中. 燕行录续集: 134. 首尔: 尚书院, 2008.
- [10] 李尚迪. 恩诵堂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 韩国文集丛刊: 312. 首尔: 景仁文化社, 2003.
- [11] 李尚迪. 海邻尺牍[M].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手抄本.
- [12] 黄细嘉. 黄爵滋生年要录[J]. 抚州师专学报, 1995(4): 18-24.
- [13] 孙衣言. 逊学斋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662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4] 尹程. 西行录[M]//林基中. 燕行录续集: 137. 首尔: 尚书院, 2008: 113.

- [15]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296.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371-372.
- [16]洪奭周.渊泉先生文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293.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120-121.
- [17]曹楙坚.县云阁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52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72.
- [18]温兆海.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7-162.
- [19]孔宪彝.对岳楼诗续录[M].天津图书馆藏咸丰六年刻本:卷三:10.
- [20]黄爵滋.己西北行续草[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80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84.
- [21]李侗.李延平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8.
- [22]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3-54.
- [23]申在植.相看编[M]//林基中.燕行录续集:134.首尔:尚书院,2008:380.
- [24]吴承学.不值与不遇[J].古典文学知识,2005(6):77-80.
- [25]许筠.朝天记[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 6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364.
- [26]李一相.燕行诗[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 21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260.
- [27]柏葭.薜籜吟馆钞存[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22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2.

The Not Encountering Meeting between Huang Juezi and 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and Its Literary Influence

WU Zhenglan, HUANG Yixin

Abstract: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contact style between Chinese scholars and Korean diplomatic envoys deserves further exploring. This thesis strives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that Huang Juezi, the renowned official of Qing Dynasty, had not been in Beijing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while he was admired by Korean diplomatic envoys for long tim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not encountering meeting between Huang Juezi and Korean diplomatic envoys and its literary influence. Huang Juezi had received at least six groups of Korean diplomatic envoys during the period of being in Beijing. He entrusted his friends Zhang Binying and his son Huang Zhilin to receive Korean diplomatic envoys. Huang Juezi's literary theory that combines the "landscape" with "ghosts" by "poetic heart" gradually matured during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The negative situations such as Huang Juezi's absence, no news and death triggered the Korean diplomatic envoys' writing of not encountering and deepened the emotion of literature of journey to Peking.

Key words: journey to Peking; 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Huang Juezi; not encountering meeting

(责任编辑:文新)